

希特勒法西斯統治时期的德国 軍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

郭 吳 新

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問題，是資本主义总危机条件下帝国主义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为了充分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具体发展，和更加有力地批駁現代修正主义分子对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实質的歪曲，我觉得有必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探討各国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德国的垄断資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資本主义轉变得比較早，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德国还是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因此，作者首先选择德国作为研究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发展史的对象。

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本文中不准备系統探討德国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只想集中分析它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即希特勒法西斯統治时期的軍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阶段。

关于希特勒德国軍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出現的历史条件、它的主要表現、它所引起的各种后果以及它的实質，拟在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一、希特勒德國軍事國家垄断資本主义出現的歷史条件

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軍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是資本主义总危机第一阶段上，德国各种經濟、政治和历史条件錯綜結合的产物，促使它出現的条件是多方面的。

长时期以来，在生产和資本的积聚和集中方面，在垄断化的程度和財政資本的組織性方面，德国均具有較高的水平。远的不說，据德国統計局的材料，在資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中，德国各垄断組織即已控制了全国資本总额的65%和重工业产值的85%。^①按生产同銷售的整个垄断化水平而言，德国在当时已超过美国。这一时期，德国卡特尔的数目也增加了，战前已有的一系列垄断組織扩大了自己的規模，而且在有关垄断資本集团相互合并的基础上，在德国还出現了資本主义世界第一流的大托拉斯，如鋼托拉斯及法本化学工业托拉斯。德国財政資本的組織性也相应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毫無疑問，德国生产和資本的积聚与集中的上述高度水平，德国垄断資本的統治地位及其突出的組織性，正是法西斯时期軍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形成的基础和一般条件。

但是，上述基础和一般条件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說来，还只是說明了事态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对于在这一政权之下德国終于向軍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

^① 轉引自：H. 戈里德施坦因及 P. 列文娜：《德国帝国主义》，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第176頁。

急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指明促进这些过程出现的其他具体条件,以及决定这些过程的直接原因。帝国主义战争和深刻的经济危机,由它们所引起的帝国主义德国一切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极度尖锐化,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恰恰就是这种起过促进作用的具体条件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直接原因。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给德国带来了巨大创伤和灾难性的后果。战胜国强加给德国“凡尔赛和约”,实际上是“绞杀德国”的条约。这些事件,不仅导致了战争初期德国经济和政治矛盾的一度空前激化;而且,也给整个战后期间的德国经济和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以“道威斯计划”和美国资本大量渗入为标志的相对稳定时期里,德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矛盾,正是在前述基础上,再度更广泛地更深刻地发展起来了。在经济方面,由于巨额赔款负担和资金的不足,由于国内外市场的狭窄和对外国资本、首先是美国资本的强烈依赖性,和其他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德国资本主义具有特别虚弱和不稳定的根基,经济危机的因素成熟得相当迅速。继1926年出现的中间性危机之后,1927年秋便开始了消费品生产的下降。1928年起,整个工业生产实际上已停滞不前。在政治方面,由于“凡尔赛和约”的沉重压迫,由于德国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双重奴役,德国人民对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愤怒,更象山岳一般地逐年积聚起来。同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后果密切相连的困难重重、矛盾四伏和险象丛生的状况,就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写实。

在上述情况下,1929年秋,经济危机终于在德国爆发了。在危机的最低点年度,即1932年,德国工业生产减少了40.6%,即退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①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全国半数左右的工人完全失业。信贷危机也迅速爆发,农业危机重新尖锐起来。危机还使德国对外贸易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说来,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持久和深刻的经济危机。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按生产下降的幅度和失业人口的规模等说来,德国仅次于美国,而居于第二位;但是,由于德国经济基础特别脆弱,其实力远远不如美国,因此,德国所受到的危机的打击,实际上要比美国惨重得多。德国资本主义制度已面临着全线崩溃的直接危险。危机期间德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再一次熾烈起来,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大大增强了,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面临着国内上述的严重经济局势和政治危机,面临着德国帝国主义制度摇摇欲坠的事实,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明确意识到不能继续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来延续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也不能继续用所谓“和平对外政策”来摆脱在国际关系中的现状,于是转而全力支持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上台。他们企图通过国内政治的法西斯化和实行公开恐怖专政,通过经济的军事化和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来寻找逃离困境的出路。另一方面,危机期间,希特勒法西斯党的势力也扩大起来了。垄断资本的资助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持,是法西斯分子猖狂得势的基本原因。同时,由于他们打着“民族社会主义”的虚伪旗号,还欺骗了相当大一部分比较落后的群众。1933年初,得到美、英等帝国主义者暗中支持的希特勒,利用了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政策和工人阶级的暂时软弱,终于在德国垄断寡头的亲自安排下,夺取了国家政权。在掌握政权以后,按照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希特勒分子即厉行法西斯统治,大力扩

① 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88页。

軍备战，迅速把国民經济轉上了軍事化的軌道，并积极进行对外武装侵略，从而揭开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即法西斯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时期。以后，在資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这种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更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达到了自己发展中的頂点。

以上情况說明：希特勒德国的軍事国家壟断主义，正是資本主义总危机在德国加深的产物和反应；它的出現及发展，是由作为資本主义矛盾最尖銳的表現形式、即帝国主义战争和經济危机所促成的。

当然，在研究希特勒时期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时，也应注意到德国帝国主义深远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和軍国主义的反动历史傳統的作用。作为向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过渡最早的国家，德国統治階級在过去历史时期中，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經积累了不少有关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反动經驗。在向法西斯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过渡的新时期中，德国統治階級利用并发展了这些反动經驗，从而給自己的罪恶活动帶來了便利，并加速了事变的进程。同这点相类似，德国帝国主义的长期軍国主义傳統，不仅为希特勒保留下相当数量的反动的、侵略成性的軍事干部，而且也為希特勒准备了为数不少的长期受到軍国主义思想侵蝕的落后羣众，这自然便利了法西斯政府扩軍备战政策的推行，便利了德国壟断資本主义向新的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过渡。由此可見，从一定的意义上說来，德国帝国主义深厚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和反动軍国主义的可恥傳統，也是促进希特勒統治时期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出現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希特勒德國軍事國家壟断資本主义的主要表現

希特勒法西斯专政时期，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在德国得到了空前的、全面的、高度的发展。

这一时期，德国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現于以后几个方面：首先，国家向壟断組織进行大規模的軍事採購和訂貨；其次，国家强力促进生产和資本的积聚和集中；第三，国家对軍事化經济实行全面的干預和調节；第四，扩大国有财产和将国有财产轉归私人資本的活动交叉进行；第五，国家全力支持壟断資本集团并同后者一起，对其他国家进行經济扩张和軍事掠夺；最后，壟断資產階級同政府的“个人联合”极度加强。关于这些表現的具体內容，現在在下面順次加以論述。

(一)

希特勒德国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主要表現之一是：在加紧压榨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国家通过龐大的軍事預算和向私人壟断組織进行大量的軍事採購和訂貨，而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壟断資本集团的重新分配，以保証这些集团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在法西斯德国，軍費支出的增长速度和規模是惊人的。1932年，即希特勒上台前夕，德国的軍費支出仅为6.7亿馬克，約占到当年国家預算总支出的1/10或国民收入的1.5%。^①

① 《苏联与資本主义国家（統計集）》，統計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

1933—1939年秋的六年半备战期间，据希特勒自供：德国全部备战支出在900亿马克以上，①即差不多占到同一时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3/5或国民收入的1/4。②即使按不变价格计算，法西斯德国的这项备战费用，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全部军费支出！第二次大战时期，德国的军费支出更急剧上升，在不足六年的时间内，它共计为6220亿马克，占到了同时期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92%，并超过了德国本国（按1937年国界计算）战时国民收入的10%左右！③

德国劳动人民是法西斯“第三帝国”浩大战费的主要负担者。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则是希特勒政权开辟战费来源及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法西斯专政的十二年中，德国的年度税收收入额上升了4—5倍，共计增收了税款约2000亿马克；国债由115亿马克提高到3793亿马克，即增加了32倍；流通中的货币量则由36亿马克（1933年底）加多到675亿马克，即膨胀了近18倍。④这些沉重负担归根到底压倒了劳动者的身上，它使得德国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低。例如，即使按官方材料，1932—1938年，德国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由59.8%下降为52.2%。⑤为了弥补战费的不足，希特勒匪徒还对广大占领地区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劫掠。

以庞大的军费支出为基础，法西斯国家在十二年中向垄断组织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军需品采购和订货。据计算，战时德国国家订货总值每年约在1000—1500亿马克之间，六年共计约为7000亿马克。⑥巨额军事订货和采购是国家按垄断资本集团意志实现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基本方式，也是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公开“盗窃国库”来攫取高额战争利润的大好时机。事实上，仅从国家战时订货中，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获得了不下700—800亿马克的血腥利润。⑦

（二）

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法西斯德国的另一重要表现在于：希特勒政府成立以后，即根据最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大力执行剥夺犹太人资本、强制卡特尔化、淘汰中小股份公司、封闭小工商业店号和消灭低级卡特尔的政策，人为地促进“雅利安”资本对犹太资本的

① 参见：阿伯特·米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2页。

② 参见：阿·米·阿列克谢也夫：《资本主义国家战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3、45页。

③ 军费及其在国家预算中的百分比，见：同上书，第47、49页；战时德国本土国民收入，参见：《英法美德日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191页，但文中所列军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系引者的推算。

④ 参见：艾·布列格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税收、公债和通货膨胀》，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82、283页；阿·米·阿列克谢也夫：《资本主义国家战争财政》，第45、47、139—140、173页。

⑤ 转引自：尤尔根·库茨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1933—1945年5月），柏林1953年德文版，第109页。

⑥ 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318页。（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由于迅速覆亡，国家的军事订货合同有一部分未及付款——本文作者注。）

⑦ 同上书，第318页。

吞并，促进垄断组织对中小企业的控制和吞并，促进垄断资本集团内部的兼并，以加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从而扩大最大垄断集团的财势。

希特勒分子登台以后，即疯狂地掀起所谓“排犹运动”，帮助“雅利安”财团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由于这一“运动”，共计约60—80亿马克^①的德国犹太资本，通过强力没收或被迫易主的方式，全部转到了“雅利安”财阀和法西斯党魁手中。

强制卡特尔化政策，是法西斯政权扩大垄断组织统治及加速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重要措施。从第一次大战以来，历届德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执行了这个政策，但它的最充分实施却在希特勒统治年代。1933年7月，希特勒政府颁布所谓“卡特尔条例”，规定帝国经济部有权建立新卡特尔，而一切卡特尔则有权限令局外企业合并进来。任何反对这种规定的局外企业，有关的卡特尔可以拒绝承认它们，从而剥夺它们得到原料和商品等等权利，实际上在经济上宣布了有关它们的死刑。在这种威胁下，大量中小局外企业被交到了垄断组织的直接暴虐统治下面。卡特尔数目也迅速增加。1930—1936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总数，由2100个增加到2500个，即上升了近1/5。^②

淘汰中小股份公司是法西斯政府促进资本集中和扩大大企业优势的另一重要措施。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股份公司改革法”，按照它的规定，凡资本不足10马克的小股份公司，应予淘汰；而新设立的股份公司，资本额不得少于50万马克。结果，据德国官方统计材料，1931—1943年11月，全德资本额在10万马克以下的小股份公司，89%遭到淘汰；资本额从10万至50万马克的股份公司，减少了56%，资本额在50—500万马克之间的次大公司，也减少了25%，而资本额超过500万马克的大股份公司，则增加了16%强。^③在全德股份资本总额中，后者的比重提高了，它由74.5%上升到83.3%。^④随着大量中小股份受到淘汰，每一股份公司的平均资本额，在1932—1943年间也大大提高了，它由231万增加到554万马克，即上升了1.4倍。^⑤中等资产阶级的力量大为削弱了，而各大康采恩及托拉斯则联合控制了全德股份资本的4/5以上。

国家促进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又一表现是强迫封闭大量手工企业和小型零售商号。1937年起，由于军事工业的劳动力供应问题日益尖锐，法西斯政府乃在“清理”手工企业和小商号的幌子下，连续颁布了若干法令，勒令所谓“负担过剩”及“经济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业和小商号停业，把以百万计的手工业者及小商人驱入军事工厂服苦役。据计算，1937—1945年，被迫停业的手工企业在26万家以上，小商店在32万家以上（即超过其总数的2/5）。^⑥这种血腥暴力行动，不禁使人们回想起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罪恶图景！大量小企业的强

① 瓦尔加：《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之变化》，中译本，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59页。

② 尤尔根·库钦斯基：《德国帝国主义历史研究》，第1卷，柏林1952年德文版，第109页；H.戈里德施坦因及P.列文娜：《德国帝国主义》，第221页。

③ 转引自：瓦尔加：《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之变化》，第47页。

④ 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第396页。

⑤ 尤·库钦斯基：《德国帝国主义历史研究》，第1卷，第112页。

⑥ 尤·库钦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第36页。

制消灭，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

在强力吞并和控制局外企业的目的基本实现以后，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突出起来，它们的相互倾轧和吞并活动达到了高潮。最大垄断资本集团从独吞战争利润出发，于是重新援引前述的“卡特尔条例”，但其开刀对象已不是中小局外企业，而是数量众多的低级卡特尔了。法西斯政府执行最大垄断寡头的这种指示，藉“合理化”和“整理卡特尔”为名，陆续消除了绝大部分比较弱小的卡特尔。后者一部分被直接并入了高级垄断组织，另一部分则被迫把原有业务转交相关的经济集团逕直处理。结果，到1943年4月，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总数剧减到500个，即只剩下了1/5。^①

除上述各项活动外，希特勒政府还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手段，协助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其他国家人民，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关于这一点，准备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

从积极准备和进行重新瓜分世界的侵略性“总体战争”出发，从保证垄断资本集团、特别是军火和重工业垄断集团的最大利益出发，希特勒政权在十二年中，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领域，采取了广泛的干预和调节措施，以便推行和不断加强经济的军事化，这是法西斯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

法西斯国家对经济的全面调节，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即已基本实现。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化经济调节机关，是这方面的重要步骤。在扩军备战的第一阶段（1933—1936年秋）上，最高中央调节机关为帝国经济部。在它下面，首先有各种专业管理局，分管各工业部门、农业、市场、对外贸易、物价等等。同时，根据1934年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各垄断组织基础上，还新设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交由垄断寡头及其亲信直接掌握。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经济集团，共有四级。最上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等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它们下面又分350个部门集团；最下一级则为640个专业集团。工业集团是部门集团的主体。地区调节机构采取了省经济厅（下属市、区分支机构）的形式，全德共有18个。这两类调节机关均具有政府机构权力，它们统一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同时，两者的地方基层组织又是统一的东西。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及法西斯政权企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另外，须着重指出的：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特设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它是由垄断寡头直接把持的备战经济总参谋部，拥有无限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订工作。至此，法西斯式的经济调节机构已形成一个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体系。

1936年秋起，法西斯德国进入了全面备战阶段，即所谓“新四年计划”阶段。为了夺取对军事化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四年计划全权督办”戈林，另外设立了自己的一整套调节机构，即所谓“执行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从此出现了两大中央经济调节系统平行并存、争权夺

^① 参见：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第136页。

利、职能重复和相互倾轧的局面。这表明了法西斯备战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加强，也反映了财政寡头、特别是新老财政寡头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和表面化。

大战爆发以后，上述两大调节系统继续存在，其附属机构甚至还在增加。同时，另有两类机关势力崛起，也或多或少地具有了中央经济调节机关的权力。其中之一是国防军最高指挥部所属的经济总局，它除插手军火生产外，专管对占领地区的掠夺活动。另外一个军火弹药部（下辖若干主要管理局），1942年以后它的权限猛烈扩大，并从其他调节机关夺得了管理军火生产及分配与供应原料的实权。在军火弹药部下面设置有“军备委员会”，其权势相当于战前的“经济总委员会”。于是，德国的经济调节系统，由战前的双头并存发展为战时的四头混战局面，这反映了垄断资本集团之间争夺战争利润斗争的加剧，也反映了德国经济无政府状态在战时的进一步加强。

为了缓和各种调节机构之间的矛盾和企图对战争经济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希特勒政府采取过若干措施，如建立“战时经济总委员会”之类的太上协调机关，但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而必然出现的残酷竞争条件下，它的各种措施都落空了。在研究了法西斯战争经济所具有的庞杂混乱的经济调节机构材料之后，连西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供认：“……集中领导德国的军事经济，长期来是一种空想。”①

大量设立经济调节机构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先后提出了三个所谓“四年计划”。第一个在1933年春制订，它打着“与失业作斗争”的幌子，实际上是把数百万失业者驱入军事工厂或军用建筑工地，强制进行苦役劳动。第二个于1936年提出，它以“自给自足”相号召，企图通过发展冶金、采煤、动力、机器制造和粮食生产等部门，来恢复及扩大军事经济的原料基地与生产机构，这实质上是进一步改组国民经济以完成“总体战争”准备的侵略性计划。最后一个产生于1940年10月，它虽然是第二个“四年计划”延长执行四年的产物，但已具有了新的内容，它是一个直接进行侵略性“总体战”的计划，其目的在于纠集全国经济力量，以求在世界大战中侥幸一逞。

三个“四年计划”都是经济军事化的计划，它们表明了德国垄断资本在不同阶段上按军事化原则调节经济的具体企图。

希特勒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种干预和调节在备战时期已具有巨大规模，而在战时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法西斯德国，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领域，处处都有国家干涉的鲜明烙印。

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是法西斯政权干预和调节的最重要对象。希特勒国家调节生产的指导方针是：对军需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原料、劳动力、资金及设备等等，采取优先供应原则，以片面扩大军需品的生产。

德国的原料自给率一向较低，绝大部分重要战略原料（石油、铝土、橡胶、大部分金属矿石）素来全部或基本仰赖进口，扩军备战及发动大战更使原料问题空前尖锐起来。因此，希特勒政权对原料的生产、供应和分配，一开始即采取了严格的调节。具体说来，在这方面的调节措施主要有以后几个方面：第一，逐年大量进口各种稀缺原料，建立国家战略原料储

① 《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西德经济研究所编），中译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页。

备。如在战争前夕，每年即进口数千万吨各种金属及其矿石。其次，扩大本国原料生产、特别是合成化学原材料生产（“人造”的汽油、橡胶和纤维等），广泛使用代用材料，企图实现一系列重要原材料的“自给自足”。在军事需要迅速增加的情况下，这种打算基本落空了，德国原材料的自给程度极少改善。如1939年原材料的自给率为：黑色金属——50%，有色金属——20%左右，人造液体燃料——30—40%，纺织原料——15—20%。^①第三，严格控制原料的分配和消费，一再削减对民用工业和中小企业的许多基本原料供应额，优先保证对军火及重工业垄断组织所属企业的原料供应，同时强调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料消耗定额（有些情况下甚至引起军火质量下降），以缓和原料供应的不足。最后，残酷地掠夺占领地区的原料储备及资源。掠夺的规模相当惊人，即使根据德国官方显然压低了的材料，以1943年为例，被占领国家在许多种重要原料生产方面，均占到德国本部产量的20%或更多。^②尽管如此，德国原料的供应一直极其紧张，特别在战争后期，原料缺乏和供应脱节现象层出不穷。同时，即使国家调节措施五花八门，由于各垄断组织的激烈争夺，加上套购、囤积、浪费、掺假手法不断翻新，德国战争经济中的原料分配及消费，不仅实现不了“计划化”，无政府状态还日趋严重。

在劳动力的调配和补充方面，希特勒政府也强力加以干预。国家调节劳动力的分配的主要措施是：强制数百万失业者参加军事苦役劳动；用血腥手段强迫以百万计的手工业者和零售商转入军需工厂；从家庭和学校中驱出数百万妇女、老人及半成年人，把他们吸收到苦役劳动岗位；系统地勒令劳动者从轻工业转入重工业，特别是军火工业部门；把超过1000万的青壮劳动者赶进法西斯侵略部队，同时从前线及占领区用恐怖手段运进1000万以上的战俘和别国平民，到德国作苦工奴隶（其中半数左右被折磨而死），以抵补德国劳动力的缺额。^③为了贯彻上述各种措施，法西斯政府先后颁布了许多强制性的法令（例如，1938年的“普遍强制劳动服役法”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并在战时不止一次地进行所谓“总动员”。结果，一方面，全部劳动者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移居的任何自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军事苦工奴隶或炮灰后备者；另一方面，在民用消费品生产等一系列部门和领域劳动力数量锐减的条件下，从事军需生产的人数和法西斯侵略军员额则剧烈增长。1939年秋，德国军需生产部门就业者达到240万人，即占全国工业劳动力总数的1/5强；1944年他们进一步增为660万人，从而占到全国工业劳动力总数的3/5以上。^④至于动员入伍人数，在1939—1944年间，则由140万增至1300万人。上述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希特勒式劳动力调节政策极端反动的实质和目的。实际上，法西斯德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劳动苦役军营”。

国家对投资调节和设备供应的根本原则，同样是优先保证和军事生产直接相关的重工业

① 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第256页。

② 参见《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第7，53—54页。

③ 据帕·别洛夫的材料，1944年底在德国的外国工人为1300万人，见《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第7页；而据库钦斯基的估计，整个大战时期被希特勒匪帮驱往德国作苦工的外国人总数至少有1400万人，见《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第266页。

④ 《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第196页。

⑤ 同上书，第151页。

的发展。1933—1939年，据“德国统计年报”的材料，全德国工业投资为164亿马克，其中126亿（占77%）投入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①英文版“国际新闻公报”所披露的数字则远较此数为大，据它的报导，1933—1938年，德国仅投入军事工业的资本，即达226亿马克。^②大战期间，在工业总投资中，第Ⅰ部类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即超过了80%。仅在第Ⅰ部类的三个主导部门——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及化学工业——中，战时即投资500亿马克以上。^③法西斯这种调节投资政策的结果，在牺牲民用工业的条件下，大大促进了军火工业及与其相关的各重工业部门生产机构的片面扩大。

国家对工业的干预和调节，除以上各种重要措施外，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例如，早在1936年，法西斯政府即根据战争经济的要求，在全德实行了“工业普查”，对包括在300个左右工业部门内的18万家工厂加以登记，为它们逐个制订“专门执照”，其中规定了它们的生产能力，进行军用改组的期限及具体办法和完成军事订货的预计图表。同时，还制订了200种基本材料的生产计划，绘制了军需品生产的全国地区分配图等。在所有上述各种调节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法西斯德国的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火生产迅速扩大起来。依靠牺牲轻工业和民用产品工业，尽管战时许多具体军火生产计划一再没能完成，但整个说来，德国军火生产仍出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如以1933年为100，则以后年代的指数是：1936年—300，1939年—1250，1944年—6250，即在11年中提高了61.5倍。^④与此同时，消费品工业生产在1939—1944年间，反而减少了1/7左右。^⑤德国工业各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极度加强了。

在大力调节工业生产之际，法西斯政权也力图对农业活动实行全面控制。帝国粮食局及其下属的数万个基层机构，是希特勒政府干预农业活动的基本工具。1936年，根据“新四年计划”规定的粮食及农产品“自给自足”的要求，在普查农业的基础上，制订了所谓“战时全国粮食平衡表”，计算了农产品生产、储备和食品分配定额。在希特勒整个统治时期，全部农业事务，即包括：播种面积及作物类别、农业就业人数、化肥的分配、饲料的购买、农产品义务上缴数量、农产品价格、经营农产品贸易的利润额、农户的收入，甚至农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运送给城市亲友的蛋品数量等，无不受到国家的控制。当然，国家对农业的调节，其目的也是为侵略战争服务，为加强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及反动富农的统治服务。但是，法西斯对农业生产的调节是根本失败的，以备战时期为例，德国的粮食产量基本上停滞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每年平均的粮食进口量仍与20年代差不多，即在400万吨上下。^⑥所谓“自给自足”，完全变成了笑话。

法西斯国家调节和监督的黑手，同样也伸到了国内及对外贸易领域。在国内贸易方面，政府设立了庞大的市场管理机构，为各种商品的供应、分配及销售，分别制订了繁多的营业

① 《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第11页。

② 转引自：H.戈里德施坦因及P.列文娜：《德国帝国主义》，第241页。

③ 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第266页。

④ 《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第15和249页。指数经过引者换算。

⑤ 同上书，第217页。

⑥ Г.Г.卡托夫：《德国的农业关系与土地改革》，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67页。

法規，企图达到严格管制的目的。同时，希特勒还专门委派了“帝国物价专员”，推行所谓“固定价格”的政策。事实上，这些措施不仅不能限制垄断组织的活动，反而给他们攫取高额商业利润、排挤中小商人和搞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各卡特尔的商品垄断价格由于“固定价格”政策取得了法律保障；卡特尔又利用无数次“例外批准”，来不断抬高自己的商品价格；卡特尔还趁消费品的缺乏时机，大搞黑市交易，并以劣质货冒充好货欺瞒顾客，等等。

在对外贸易方面，国家的监督调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颁布法令或计划，如“调节贸易及原料和半制品分配法”、“沙赫特的四点计划”之类，把一切外贸活动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其次，通过提高进口税及规定进口限额的办法，扩大战略原料进口，并相应缩减民用必需品的输入；最后，在所谓“输出或者死亡”的口号下，通过向垄断组织发放出口补助金（战前每年平均达10亿马克左右^①）及给予各种优惠待遇的办法，鼓励出口，以换取外汇。可见，全部外贸调节活动只有一个目的，即为战争和垄断资本服务。

从搜括资金以扩大战费来源出发，法西斯政权对国内外货币信贷业务也实行了干预和监督。它一方面不止一次颁布“银行法”和其他法令，扩大帝国银行权力，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后者手中，好随心所欲搞通货膨胀的把戏；强使各银行把准备金和居民在储蓄局的存款转投入国债，以搜罗更多的战费；限令各银行的短期贷款转为长期贷款，并把大额贷款及证券业务的批准权集中到政府专门机关手里，使资金更集中为垄断组织服务，等等。另一方面，则执行拖延直至完全停付外债本息的政策，严格控制外汇的动用，企图减轻黄金及外汇储备缺乏的困难。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法西斯政府的上述措施，并未导致货币资本市场的“计划化”和稳定，随着国家备战和战争经济状况的恶化，货币和资本市场变得愈紊乱和紧张了。大批资金来源转入垄断资产阶级的腰包，社会资本大规模地变成了虚拟资本，垄断寡头的投机活动日益猖狂起来，股票交易所风潮一起再起。同时，一方面是通货膨胀逐年加深，巨量的银行资产和各种存款变成了虚有其名的国家债券，国家的黄金储备锐减到一再接近枯竭，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却大发备战和战争财，并把大量现金外汇以各种方式转逃至国外。

法西斯国家对收入和消费的调节，最鲜明地暴露出其经济调节的反动阶级实质和路线。在个人收入方面，希特勒政权一边冻结工人的工资，使他们的实际收入由于物价上涨、特别是由于黑市商品价格奇贵而不断下降；另一边则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家的军事利润。法西斯政府虽然一再颁布过所谓“限制红利法令”，并在战时开征过“超额利润税”，但这不过是装幌子，帮助垄断资本欺瞒愤怒的人民而已。例如，1934年的“限制红利法令”规定红利率不得超过6%，实际上当时平均红利率仅略高于3%，^②这无异是提高红利的法令。其后，在军事利润暴增的情况下，各大公司则把实际利润的绝大部分转为各种“基金”，使帐面上的红利率“符合法令规定”，藉以掩耳盗铃。至于“超额利润税”，它直到1941年秋才被迫开征，三年中仅共收10亿马克，即仅为同一时期工资税总额的7.6%。^③

① 弗·弗·拉斯普京：《希特勒侵略的经济准备》，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03页。

② 参见：尤·库钦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第33页。

③ 参见：阿·米·阿列克谢也夫：《资本主义国家战争财政》，第121页。

在消費方面，法西斯政府执行了同上的階級方針。早在备战年代，国家即实行了降低劳动者消費品的数量和質量的政策。大战时期，利用历史上的反动經驗，国家对人民消費迅即进行了全面严格的限制，采用了配給制度，配給証多达62种。^①在配給时，还按保証侵略性軍事經濟机器运转的不同需要，給不同配給对象規定了不同定額。以口粮配給为例，一般居民的定額，仅为現役軍人和軍事工业最重体力劳动者的60%左右。^②并且，他們还不能經常保証得到官定的配給額，更何况配給額还随着战争的发展一再降低。至于資产階級、法西斯官員及其他特权分子，事实上完全不受配給制的限制，他們照旧华衣飽食，随心所欲。关于这种消費調节的性質，列宁早已指出：它只是“反动官僚办法”，它“不容許”人民大众“監督富人”，却“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③

希特勒国家对階級关系的强烈干預，也同样明显化暴露了其經濟調节政策的反动階級本性。根据資产階級的意志，希特勒早在1934年即頒行了“国民劳动法”，它規定資本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的所謂“領袖”。工人对“領袖”应絕對服从，“領袖”則拥有决定工时、工資、解僱及处罰工人的法定特权。在这种“領袖制”下面，工人实际上变成為資本家的奴隶。在农村中，法西斯式調节階級关系的特点是：把广大劳动农民交由容克地主及反动富农尽情压榨。为在农村中培植人数众多的反动富农階級，作为法西斯政权的可靠政治經濟支柱，希特勒政府除以各种优惠待遇促使大批富农移植到东部边区外，还特別頒布了“农地繼承法”，用各种优待办法吸引反动的富裕农户，使之成为所謂“真正德国农民”的“农地繼承戶”，以充当希特勒的忠实鷹犬。到1939年，这类反动富农已达69万户，即占农户总数的23%，并拥有全部农业土地的39%。^④

綜上所述，可以明确看到：法西斯式的經濟干預和調节，虽然也打着“經濟計劃”的幌子，但它与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从其本質看来，二者是完全相对立的。希特勒政权对經濟的軍事化調节，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壟断資本利用国家政权謀取本階級利益的一种反动形式。这种事实，又一次証明了列宁下述論断的正确：即作为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表現形式的“‘調节經濟生活’的結果是給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軍事苦役營，給銀行家和資本家建立起天堂”。^⑤

(四)

希特勒德国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还表現在备战和进行战争时期国家所有制的扩大和加强，以及在企业利潤由于經濟軍事化而得到充分保証的条件下，把一部分国有财产轉到私人壟断資本集团手里。

德国国家所有制有着长期的历史。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它獲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首先

① 瓦尔加：《战后資本經濟之变化》，第12頁。

② 參見尤·庫欽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冊，第103頁。

③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7頁。

④ Г.Г.卡托夫：《德国的农业关系与土地改革》，第52頁。

⑤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4頁。

表现在：国家所掌握的股份资本额增长了，它在全国股份资本总额中的比重也显著提高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①

年 份	国家直接控制的 股份资本额 (亿马克)	前者在全德股份资本 总额中的比重 (%)
1932	29	13.2
1936	25 ^②	15.3
1939	36	17.0
1943	74 ^③	25.0

由于国家还全部掌握了铁路、邮政，并参与了其他若干事业，国家垄断资本的总额实际上远大于国有股份资本额。1939年，德国国家垄断资本共计为248亿马克，即占到全国总资本的1/5强；1943年后一比重更进一步提高到1/3以上。^④

法西斯专政时期，德国国家垄断资本的扩大，是在残酷剥削德国工人、强制剥夺犹太人产业、政府巨额财政拨款、以及血腥掠夺广大占领地区的基础上实现的。国有资本的增长，具体说来，有两种基本方式：首先，是扩大原有国家企业的资本。如国营联合电力及矿业股份公司的资本额，在1940—1943年间，即由1.5亿马克上升到5亿马克。^⑤其次，建立大批新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和企业。在备战及进行战争时期，国家新建了一系列的生产合成燃料、橡胶和酒精，炼铝、冶铁和炼钢，以及制造飞机和汽车的工厂，还创办了若干银行与信贷公司。赫尔曼·戈林康采恩是新设的一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它创办于1937年，开始的目的是开采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沙斯基特尔的贫铁矿，原有资本仅500万马克。以后通过各种兼并和掠夺活动，其自有及控制的资本额飞速增长：1938年春—4亿马克，1939年春—7亿马克左右，1941年—25亿马克，1943年—60亿马克。^⑥结果，戈林康采恩变成了德国及欧洲最巨大的康采恩之一。

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完全是为垄断组织和一小撮财政寡头服务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后述各种事实得到完全证明：第一，国家企业的设立或扩充，是为了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藉以弥补私人垄断组织活动的不足。例如，沙斯基特尔贫铁矿的开采，是垄断资本备战过程中的迫切需要，但投资显然带有风险，于是蒂森、克虏伯、弗利克之流的垄断寡头，

① 材料来源：《西德的垄断组织与国家》，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195页；《西欧各国的国家所有制》，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10页；瓦尔加：《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之变化》，第47页。

② 由于希特勒政府把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国家收购的一系列私人企业股票陆续卖还给垄断寡头，引起了国有股份资本额的一度下降。

③ 系作者的估计。

④ 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第156页；《西欧各国的国家所有制》，第210页。

⑤ 《西欧各国的国家所有制》，第209页。

⑥ 同上；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第65及401页。

乃一方面极力促成国营戈林工厂的設立；另一方面，他們又以攫取后者30%以上的股票（全为优先股）的办法^①，既能瓜分紅利，又可以对戈林公司施加影响。至于投資風險，則全由国家負担。第二，从国家企业的营业方針看，情况同样明显：毫无例外地，国家企业的营业活动，总是这样或那样地給予壟断組織各种便利和利益，以保証后者利潤的增加。如国营电力公司明确实行了差額收費标准，同一度电，小用戶們比壟断組織經常要多付五倍左右的电费，^②結果，以牺牲小消費者为基础，保証了壟断組織的成本較低和利潤提高。第三，从国家企业的領導实权来看，由于国家壟断資本同私人壟断資本的紧密溶合，它实际上这样或那样掌握在壟断寡头們手中，“国家所有”不过是一个空招牌。如德国国营铁道管理委員會的16名委員中，大資本家就占了一半，其余一半則是由他們選擇的听命于自己的納粹官僚。^③壟断寡头由于掌握了一系列国家企业的領導权，于是得以利用职权千方百計为本身謀利。

在扩大国家所有制的同时，法西斯国家还在情况对私人壟断資本有利的条件下，坚决执行了国有財產重新私有化的政策，这是德国国家壟断資本为財政寡头服务的更加露骨的表现。众所周知，1929—1933年經濟危机期間，为挽救一系列壟断資本集团的破产，当时的德国政府曾以优惠价格，收購了柏林各大銀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业公司的部分股票。希特勒上台后，随着經濟軍事化的加紧，危机时亏本的企业变成了贏利的企业，其利潤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政府按照財政寡头的意志，坚决迅速地把国家一度握有的巨額股票，以廉价卖还給了相关的私人壟断資本集团。到1937年为止，国家已退出了对鋼托拉斯和其他私人重工业企业的参与，同时全部卖还了各大柏林銀行的国家股份；到1941年，国家在各大輪船公司的股票，也同样轉到了私人壟断資本集团手中。此外，战争期間，国家还先后把国有企业的許多装备，包括小型軍火企业装备，廉价卖给有关壟断組織。配合上述行为，戈培尔宣傳机构的腔調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它把“托拉斯国有化”的旧口号束諸高閣；而声嘶力竭地叫喊“真正的德国經濟政策”是指望“純粹的企业主經營”了。^④法西斯国家作为壟断資本工具的反动本質，通过这一自我招供更加大白于世。

从关于法西斯国家所有制的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明显認識到：法西斯式的国家壟断所有制不过是私人壟断所有制的一种补充物，而两者不論在表面上差別如何，实际上都是德国壟断資產階級掠夺駭人听闻的战争利潤的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形式。这正是法西斯国家壟断的反动本質所在。

(五)

希特勒統治时期，德国壟断資本同法西斯政权紧密合为一体，使用一切手段，直到发动侵略战争，以加强实行对外擴張和全面掠夺，是研究法西斯德国军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表現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德国壟断資本利用国家政权实行对外擴張，毫無疑問，其矛头是針對世界一切地区和国

① Н.戈里德施坦因及 P.列文娜：《德国帝国主义》，第302頁。

② 參見：阿柏特·諾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訓》，第116頁。

③ 參見：同上書，第115頁。

④ 轉引自：Н.戈里德施坦因及 P.列文娜：《德国帝国主义》，第303頁。重点是引者加的。

家，其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在对外扩张中，就战前“和平时期”说来，最能突出表现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则是法西斯德国利用其经济、政治和外交压力，强行夺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场，首先是东南欧各国的市场，使后者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变成德国的农业原料附庸国。

德国是第一次大战中的战败国，军事力量一度遭到削弱，同时资金异常缺乏，在这种条件下，当扩军备战任务尚未完成时，希特勒德国在进行对外扩张中，就不得不采取符合自己当时实力的较为隐蔽的方式。在向东南欧各国扩张方面，法西斯德国的主要方式是：强迫这些国家同德国分别签订所谓“双边贸易协定”（第一个是“德保贸易协定”，于1933年签订），实行不利于东南欧各国的“划账清算制度”（即以货易货的非现金结算制度），系统地掠夺各国的战略原料（石油、有色金属、铝土、木材等）和农产品，并扩大对各国的商品输出。结果，德国在东欧各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急剧增长了，如下表：①

1932—1938年东南欧国家同德国的贸易

国 别	自德国进口 (百万马克)		进口中的德国 比重(%)		向德国出口 (百万马克)		出口中的德国 比重(%)		1933—1938 年对德国的贸易 顺差(百万马克)
	1932	1938	1932	1938	1932	1938	1932	1938	
保加利亚	20.8	56.4	26	48	34.5	84.3	26	52	71.0
希 腊	23.5	111.1	10	29	58.9	93.6	15	39	20.8
匈 牙 利	47.4	110.0	23	30	36.4	109.7	15	28	49.1
罗马尼亚	64.2	148.8	25	35	74.4	140.4	12	21	54.6
土 耳 其	31.0	151.4	23	47②	40.1	116.0	14	43②	34.7
南斯拉夫	43.3	118.0	18	33	29.5	107.9	11	36	14.7

在“划账清算制度”下，东南欧各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笔无法讨还的债务，它变成了各国向德国垄断资本的额外贡赋。法西斯德国的这种变相掠夺办法，也同样施行于同其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若干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等等）的贸易交往中。德国在东南欧、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大力进行全面经济扩张的结果，它大大排挤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地区中的地位，并加深了它同英、法、美、日等国之间的矛盾。

在侵略战争时期，德国垄断资本同法西斯政权联合对广大占领地区实行的直接的、公开的、有组织的和全面的军事掠夺，既是希特勒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新发展，也更加暴露出了后者的血腥罪恶本质。在美、英、法帝国主义者的纵容和支持下，德国法西斯早在大战前即先后武装兼并了奥地利和捷克，这揭开了它对占领区掠夺的序幕。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欧洲大陆，包括苏联广大西部地区在内，都陆续变成了

① 材料转引自：霍伍德·S·爱利斯：《中欧的外汇管制》，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年英文版，第259及268页；尤·库钦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第81页。部分数字经过引者校正。

② 包括当时被法西斯德国兼并的奥地利。

德国垄断资本及法西斯占领者残酷掠夺的对象。这种军事掠夺是罄竹难书的，也是无所不包的。其主要内容有后列几个方面：首先，在占领之初，各国当时所有的可武装数百万现代化军队的全部装备、数百万辆各式交通工具、大量的黄金外汇储备、战略原料和工业制品，马上被德国占领者没收，并被强制运往德国。^①其次，在法西斯军队刺刀的卫护下，通过直接没收和征用、廉价收买或无偿攫取股票等方式，德国新老财阀迅即将占领地区2/3以上的大企业变为自己的私产。例如，德国各煤钢康采恩瓜分了占领区各国的冶金工业和矿山；法本化学托拉斯和克虏伯家族强占了各国的一系列化学公司及军火企业；德意志银行及德累斯顿银行等大银行完全控制了各国的银行信贷机构，等等。仅仅在波兰，德国占领者即没收了20万个以上的各类工商企业。^②为了抢夺“战利品”，德国各垄断组织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著名的例子是：德国兼并奥地利后，钢托拉斯的代表蒂森和戈林康采恩的头子戈林，在夺取奥地利最大冶金企业“阿尔卑斯煤钢公司”的股票控制包方面，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结果戈林得胜，这成为蒂森其后愤而流亡国外的原因之一。再次，在占领期间，代表德国垄断资本利益的法西斯占领当局，还逐年强迫被占领各国交纳巨额的占领军维持费，向后者进行征款，强使后者以“划拨清算”的负债方式向德国无偿供应大批农产品和战略原料，供应巨量工业制品，甚至直接为德国侵略军生产军火。从被占领区每年输往德国的农产品和原料数量，据统计，至少相当于德国本国同时期产量的1/5左右。^③再次，德国军事占领当局还用强迫及诱骗等无耻方法，从各国强制押送1000万以上的平民和战俘，做德国苦工奴隶，供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容克地主和反动富农残酷剥削。此外，在垄断资本支持和法西斯政权推动下，成百万的德国容克地主及富农还成批涌进了捷克、波兰、卢森堡等国，强夺当地农民土地，建立自己的庄园；^④而垄断资本和法西斯政权的兇恶工具——德国侵略军官兵，也同时进行了广泛的个人掠夺，把“战利品”成车运回德国。

据不完全统计，战时法西斯德国对占领区的仅以财政掠夺为主的掠夺额，即达2335亿马克（其中包括：“占领军维持费”890亿马克，“征款”120亿马克，“划拨清算贸易债务”420亿马克）。单单这一数额，即比第一次大战时期德国的对外掠夺额多出17倍以上（按1914年固定价格计算），它相当于第二次大战时期德国预算总支出的1/3强。^⑤

德国垄断资本和法西斯匪徒的残暴掠夺，使被占领各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摧残，^⑥使各国人民陷入了地狱一般的痛苦生活。

① 参见：库兹敏诺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181，187—188页。

② 参见：库兹敏诺夫，同上书，第181—182，184—186，188页；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第176—178，187—189；И.戈里德施坦因及P.列文娜：《德国帝国主义》，第442—447页。

③ 参见：《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第53—54页；尤·库钦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第99页。

④ 参见：И.戈里德施坦因及P.列文娜：《德国帝国主义》，第457页。

⑤ 转引自：阿·米·阿列克谢也夫：《资本主义国家战争财政》，第47，185—186页；尤·库钦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第110页。同第一次大战期间的比较数，系引者换算。

⑥ 参见：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43—146页。

以上种种情况，就是希特勒和戈培尔恬不知耻地吹嘘的“欧洲新秩序”。这种法西斯式的「新秩序」，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血腥表现。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这欧洲「新秩序」及其臭名昭彰的「基础」乃是一座火山，它在任何时间都可爆发起来葬埋德帝国主义这个纸房子。”①

(六)

除上述各点外，在法西斯专政时期，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同政府的“个人联合”极度加强了，企业主职能与国家官僚职能达到了高度的整合，资本家和政府官吏的身份已相当普遍地合而为一了。无疑地，这仅是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鲜明表现；而且也是德国垄断寡头控制国家政权，并使后者服务于自己的首要保证。

实现这一整合过程的途径有两种：一方面，即基本的方面，是垄断寡头及其亲信大批地兼任法西斯政府各类机构、特别是军事经济调节机关的负责官职；另一方面，纳粹党的众多党魁，一部分变成了新的财阀，另一部分则充当了新老财政寡头的直接心腹。

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的控制，变得更为直接和严密了。这首先表现在：帝国政府原有机关中财政寡头及其心腹人数显著增加了，如大企业家兼地主胡根堡、富翁施米特和有名银行家沙赫特，先后担任了帝国经济部长；百万富翁里宾特洛甫是外交部长，前帝国银行行长、克虏伯康采恩的代表留杰尔出任了驻美大使，工业巨头盖斯当了驻法大使，等等。

然而，引起人们更大注意的变化是：随着大量政府经济调节机关的先后设立，垄断寡头及其亲信们根据法律直接占有了其中的重要职位，他们不仅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者，而且还具有政府机构负责官吏的身份。据1934年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的规定：卡特尔负责人得兼任相关的经济集团负责人。结果，帝国各经济集团的领导职位完全落到了垄断资产阶级手中。②如最重要的工业集团主席，便先后由弗利克康采恩经理滕格曼、纺织工业巨头狄利希和曼纳斯曼康采恩总经理普根担任。同时，按照省经济厅长由当地工商会主席兼任的规定，18个省经济厅长毫无例外都是大工业家、银行巨头及其心腹，如希莱德、莱茵哈特、胡柏、吕尔、皮歇茨之流。慕尼黑电气公司总经理、西门子——舒克特等一系列工厂监事皮歇茨，除当上巴伐利亚省经济厅长外，同时还担任全国经济院院长。在较下级的政府调节机关中，根据同一原则，资本家们也按自己财势的高低，分别占据大小不同的负责职位，摇身一变兼任了政府官吏。

“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及“军备委员会”，如前所述，分别为战前和战时的国家最高经济决策机构，正是在它们当中，最大财政寡头的直接控制也表现得特别强烈。在前一委员会中，共有17名委员，除5名纳粹党棍外，其余12人全为工商业及银行界的上层人物，如梯

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页。

② 只有手工业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是例外，他不是大资本家。但他须受到帝国经济部长的严密监督。——作者注。

森、弗格勒、波雪、史略德、西門子等人。而在后一委员会的13名委员中，垄断寡头及其亲信代表共有8人——蒼根、弗格勒、呂希林、波恩斯根、布什尔、凱斯勒、普米格尔及呂納特，其余5人为法西斯将军。

垄断资本家在法西斯德国，按最低限度而言，也是权势显赫的“直接指挥经济的将军”。事实上，纳粹党的各种活动，也无不唯他们之命是从。关于这一点，只须看看下面的例子就可一目了然：1933年，钢铁大王梯森产业所在地的四个行政区纳粹党负责人，联名向梯森发表了公开信，其中写道：“在我们所辖的专区以内，您是经济政策上的国家最高当局。据此，我已对我的一切机构发出以下的指示：除有关农业政策的问题以外，一切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向您请示，并认为您的决定具有约束力”。^①情况也的确如此。

在资本家兼充政府官吏的同时，执政党的党魁们和官僚们，也纷纷积累资本，投靠垄断寡头，转化为新的财阀或垄断资本的亲信。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大规模盗窃国库、进行各种投机活动、以及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占领区人民实行血腥掠夺，正是法西斯新财阀起家的主要经济基础。纳粹第二号党魁戈林，是新兴财阀的典型人物。他通过创办戈林康采恩，变成了亿万富翁。纳粹头子希特勒，每年官俸实际上超过300万马克，他同时是德国最大报业康采恩——官方的厄赫出版社的真正主人。^②宣传部长戈培尔，是纳粹德国拥有巨大产业的人物之一。其他几百个纳粹巨头，如希姆莱、列依、盖斯、格别尼斯之流，也先后成为暴发的百万富翁，其中许多人还在国外拥有巨额的秘密存款。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同法西斯官僚互相兼有对方身份的结果，他们殊途同归地变成了一身而二任的特权统治人物。就资产阶级同国家政权的“个人联合”的深度而言，就企业主职能同政府官僚职能的高度融合而言，希特勒德国不仅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空前记录，而且也达到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方面的最高水平。在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的条件下，德国垄断资本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面直接控制实现了，法西斯政权公开彻底地屈从于垄断资本的统治。

从以上各个方面看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法西斯专政条件下，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由于这种发展，德国国家政权对垄断资本的从属，达到了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法西斯国家事实上已由一小撮新老财政寡头所直接掌握，并成为他们加强剥削和镇压本国人民，以及发动侵略战争和掠夺别国人民的既残暴又驯服的工具。

三、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

经济政治后果及其本身的破产

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为德国财政资本创造了奴役本国人民和掠夺别国人民的空前有利条件，一度加强了德国垄断寡头的实力，促成了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使德国垄断资本得到了疯狂对外扩张及发动侵略战争的本钱；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又不可避免

① 转引自：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第100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121页。

地促进了德国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的极度尖锐化，从而导致了它本身的破产，导致了希特勒法西斯专政的崩溃。

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德国国内贫富鸿沟的无比扩大，剥削和压迫的空前加强，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极度尖锐化。

在经济军事化和战争条件下，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全面利用国家政权，保证了自己的利润和财富的惊人增长，是上述问题的一个方面。关于军事利润急剧增长的情况，我们不妨看一看军火工业康采恩克虏伯公司的例子。按照“西德现代史研究所档案”中的材料，1932—1938年该公司从国家接受的订货额及其利润量的变化如下（单位：百万马克）：①

年 度	军事订货总值	利 润 额
1932/1933	9.3	6.5
1933/1934	52.9	12.3
1934/1935	61.8	60.4
1935/1936	80.0	90.5
1937/1938	117.9	112.2
1938/1939	145.3	121.8
最后年度为 第一年度的 百分比(%)	1562.4	1873.8

从上表可以看出：克虏伯康采恩的利润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六年中提高了近 18 倍，并且，利润的增长显然是以军事订货额的增加为基础的，但就增长速度而言，前者又超过了后者。事实上，康采恩的实际收入远较表中列举的数字为大。根据“德国国民经济”1941年第 14 期的报告，1933—1939 年康采恩的收入共达 18.2 亿马克。②

整个说来，在希特勒统治的 12 年中，据某些作者的计算，德国最大的工业及银行垄断资本集团所得到的利润数字至少如下：克虏伯康采恩——20 亿马克以上；钢托拉斯——约 30 亿马克；法本化学工业康采恩——40 亿马克左右；弗利克康采恩——10 亿马克以上；西门子康采恩——10 亿马克左右；戈林康采恩——不少于 30 亿马克，德意志银行——超过 50 亿马克。③

由于巨额的军事订货带来的惊人利润，加上对占领区的残酷掠夺，德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财产空前增加起来。例如，1931 年到战争后期，法本公司的资本（自有的和间接控制的），由 10 亿马克以上增加到 70—100 亿马克，即增加了好几倍。④ 又例如，1938—1943 年，以疯狂掠夺而臭名远扬的戈林康采恩的资产，自 4 亿马克猛升到 60 亿马克以上，即提高了 10 多

① 转引自：《1933—1939 年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德国》，莫斯科 1961 年俄文版，第 149 页。

② 转引自：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第 126—127 页。

③ 依·莫·方加尔：《德国垄断资本发展史纲》，第 311—312 页。

④ 参见：沃·叶·马蒂略夫：《财政资本及其组织形式》，莫斯科 1959 年俄文版，第 353 页；依·莫·方加尔，同上书，第 70 页；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第 183 页。

倍。而克虏伯公司的资本，通过两次大战中的血腥买卖，也提高了9倍。^①

希特勒于1939年9月在国会声称：“没有人会在这次战争中发财”！^② 法西斯德国的现实，却证明他的谎言是多么无耻！

关于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必然后果，列宁早已明确指出了。列宁说道：这种发展是“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③ 使一小撮“‘上层份子’能够把数十亿的军事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④ 并“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⑤

另一方面，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却给德国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 财政资本实行公开恐怖的希特勒德国，的确是囚禁德国劳动人民的“军事苦工监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受到最严酷的迫害，它被迫转入地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其中许多人遭到杀害或在骇人听闻的折磨下死去。希特勒匪帮解散了全部工会组织，而代之以御用的“德国劳动阵线”。在法西斯时期，德国劳动者丧失了最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言行自由，资本家、容克地主和反动富农力图使他们成为自己刀俎上等待宰割的鱼肉！

同时，德国劳动者、首先是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也是异常深重的。据不完全的材料，1933—1940年间，德国工业中的剥削率，即自120%提高到144%。^⑥ 备战和战争费用的沉重负担，更压得劳动者喘不过气来，1933—1945年，德国每一四口之家的劳动者家庭，平均负担的战费即达二、三万马克之巨。^⑦ 剥削率的提高，由搜括浩大战费所引起的横征暴敛，大大降低了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据计算，直到大战前夕，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仍停滞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的极低的水平上。并且，约占全国工人半数的700万工人甚至还得不到危机最尖锐年代（1932年）的实际收入。^⑧ 1937年，德国每一就业工人的周净收入为22.5马克，即较纳粹官方公布的所谓“最低周生活费用”40马克还少出45%！^⑨ 大战期间，剥削率进一步提高了，苛捐杂税更多了，加上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的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进一步下降了。同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也同样不断减少。

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的同时，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大大恶化了。在战时，到处推行了10小时及12小时工作日制度，在军需工业某些企业中，劳动日还更长。劳动强度也普遍提高了。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备，生产中的不幸事故在法西斯德国直线增加。如仅在1932—

① 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第127页。

② 转引自：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第173页。

③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4页。

④ 《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7页。

⑤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页。

⑥ 沃·叶·马蒂略夫，：《财政资本及其组织形式》，第137页。

⑦ 作者自己估算的数字。参见：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第126页。

⑧ 尤·库钦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册，第145页。

⑨ 同上书，第137页。

1937年間，生产工人的不幸事故次数即由82.7万次上升到178.9万次，計增加一倍以上。^①

随著法西斯“大砲代替牛油”反动政策的加紧推行，德国人民的褲帶，甚至比經濟危机最尖銳的年代，还勒得更紧一些。1932—1938年，即使根据官方的材料，按人口計算的若干种重要消費品的年消費量，也有了程度不同的減少，如：蛋品及脂肪各減少了1/10以上；水果——1/3左右；馬鈴薯——近5%，等等。^②大战期間，消費品实行了配給制，定額又一再減少，劳动人民的生活从而陷入了空前悲慘的境地。1939—1945年，德国一般居民的每人每周口粮定額如下：^③

	粮食(克)	肉类(克)	脂肪(克)
1939年9月最高額	2400	700	340
1945年4月最低額	1700	222	109
两者的差額	700	478	231
定額下降的%	29.2	68.3	67.9

尽管希特勒匪帮尽量搜括全欧洲人民来維持德国的供应，但战时德国居民的口粮配給額仍急剧下降了。同时，也必須注意到：官方規定的口粮定額，还常常是不能兌現的。而且，到战争后期，即使假定上述官方配給額能够兌現，它实际上也达不到医学所規定的为維持人們起碼健康所需要的食品量的一半。^④結果，德国人民的健康不能不受到严重摧殘，再加上过度的劳动，居住和卫生条件的不断恶化，在战时德国便出現了疾病丛生、死亡相繼的凄慘景象。

除了政治上倍受压迫和經濟及生活上空前困苦以外，被强制綁在法西斯侵略战车上的德国人民，还不得不为侵略战争付出其他一系列的巨大牺牲：数百万人变成了法西斯制度的陪葬品，以百万計的人因受伤而終生殘廢，几百万个家庭鬧得家破人亡！

同样地，列宁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丰富事实，也早已指出了軍事国家壟断主义发展的上述悲慘結果。他曾經写道：战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措施，必然使劳动人民遭受到“愈来愈駭人听闻”的“殘酷压迫”，^⑤使他們背上沉重的“战争重担”，使他們“服軍事苦役或成为軍事奴隶”，“勒紧”他們，“紧到挨餓的地步”，^⑥同时还使他們中間的“千百万人”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葬身战场”。^⑦总而言之，在軍事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条件下，“……担负极大牺牲的是絕大多数人民”！^⑧

由于以上的各种情况，希特勒德国的階級矛盾极端尖銳化了。德国劳动者对剝削統治階

① 尤·庫欽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冊，第159頁。

② 同上書，第90頁；尤·庫欽斯基：《資本主义历史研究》，柏林1957年德文版，第182頁。

③ 尤·庫欽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第2卷，第1分冊，第103頁。

④ 參見：瓦尔加：《战后資本主义經濟之变化》，第184頁。

⑤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1頁。

⑥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4，344頁。

⑦ 《关于战争問題的根本原則》。《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7頁。

⑧ 同上書。

級仇恨如山，即使是財政資本的公开恐怖专政，也无法完全扑灭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焰。早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德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即以怠工、罢工、破坏、印发秘密宣传品等方式，反对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扩军备战和政治迫害政策，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活动。大战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反战活动进一步加强起来，并先后组成了“德国人民战线”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扩大了革命斗争的力量。这些情况说明：德军的本国后方，早已“是一座快要爆发并葬埋希特勒冒险家底火山”。^①

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德国帝国主义对外矛盾的全面激化。首先，希特勒德国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并导致了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从希特勒上台起，德国垄断资本即全力准备打破现状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英、法、美等帝国主义者以“慕尼黑阴谋”为代表的“绥靖政策”，即推动法西斯德国进犯社会主义苏联的反动政策，不仅未缓和它们同德国的矛盾，反而助长了德帝国主义的气焰，使这一矛盾更加迅速尖锐起来。正如毛主席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预先指出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② 受到西方帝国主义者长期扶植的希特勒匪帮，终于把法、英等国当作首要的开刀对象，于1939年秋发动了新的帝国主义大战。

其次，德国垄断资本对其他一系列欧洲国家的疯狂侵略和残暴压迫，导致了法西斯德国和被占领各国的民族矛盾的白热化，激起了后述各国人民对法西斯占领者的坚决抵抗。在希特勒匪帮盘踞期间，捷克工人阶级以罢工行动回答了侵略者，斯洛伐克士兵拒绝充当希特勒侵略军进攻波兰的帮兇；正象在法国一样，在挪威、荷兰、丹麦、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反对希特勒占领当局的人民抵抗运动，也如火如荼发展起来；苦难深重的波兰人民，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刽子手们，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及南斯拉夫及希腊的爱国者们，更以猛烈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了德国侵略者。这一切表明：“在欧洲各被占领国中，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全民义愤底爆发日益增长”。^③

最后，由于法西斯德国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背信弃义”的侵略和骇人听闻的暴行，它同苏联各族人民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苏联人民展开了正义的卫国战争。“苏联加入反轴心国的战争，……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底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性质”。^④ 在几年艰苦战斗之后，英勇的苏联红军不仅击退了希特勒匪帮的进犯，保卫住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而且乘胜追击，直捣了德国法西斯的老巢，对各国人民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的完全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毫无疑问，欧洲大陆各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性胜利，是在全世界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支援下实现的。从一开始起，伟大的中国人民，就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

① 斯大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页。

③ 斯大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纪念》。《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06页。

④ 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两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8页。

正确领导下，不仅使自己的“呼吸”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特别是同苏联卫国战争“紧繫”在一起，和它同“忧愁”，共“欢乐”，把“红军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①而且，还以自己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拖住了日本侵略者的后腿，使其不能进犯苏联，从而保证了苏联不致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得以集中力量首先抗击德国法西斯。美、英等国人民，也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坚决反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同希特勒分子的各种勾结阴谋活动，对苏联卫国战争进行了物质和道义支援，并要求本国政府早日结束两线战场上“奇怪的战争”局面，和真正开辟打击德国法西斯的欧洲第二战场。

希特勒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如上所述，促进了国内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度尖锐化，同时也导致了德国战时经济的严重危机和全面恶化。

在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残酷压制、剥削和掠夺下，德国战争经济不但没有得到巩固和加强，出现垄断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所期望的“高涨”或“繁荣”局面；相反地，正是在战争的打击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脆弱性却日益强烈暴露出来。战争时期，德国的直接海外贸易联系基本上被切断了，尽管希特勒匪帮加紧同“中立国”的往来，并扩大对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贸易掠夺，德国的整个对外贸易额仍很少增长，并且还由战前的出超转为入超。同时，由于青壮劳动者大批被征入伍，农业劳动被迫主要依靠妇女老幼，以及数百万受到非人奴役的外国战俘和平民，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粮食产量低于战前水平，农产品自给程度愈来愈低，以致在日益扩大的程度上被迫依靠掠夺占领区来勉强维持。运输业在战时也困难重重，燃料的缺乏及其供应脱节，使大量运输工具长期闲置，无法运转。作为战争经济主体的工业，在其最高点上，也仅比战前水平高出12.4%（1943年）。^②军事工业的片面急剧扩大，使工业内部及整个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和不平衡状况。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失败和战场转入到德国本土，原料供应及劳动力调配困难空前增长，生产能力的被迫缩小，引起了工业生产的直线下降。即使希特勒政权力求设法保证的军火武器生产，其指数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之间，也不得不猛落了55%。^③法西斯侵略军事机器的庞大需要，从而愈来愈无法满足。至于军事经济领导的混乱、财政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以及投机的猖狂和竞争的激烈，则已如前述，都达到了德国历史上罕有的程度。并且，由于战时固定资本很少更新，机器设备又急速磨损，德国的工业基础大大地削弱了。整个说来，除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战时得到了巨额血腥利润以外，法西斯侵略战争给德国及其经济带来了异常严重的损害。在战争结束时，据尼施莱格在《战争时期物质损失》一书中的估计，德国国民财富比1939年减少了53%，^④对于德国劳动者说来，这真正是：民穷财尽，十室九空！

在由于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所促成的国内外各种矛盾极度激化的条件下，希特勒“第三帝国”腹背受敌，它已无力抵挡以苏联红军为主力的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攻击，并最终走向了复灭。“第三帝国”这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的灭亡，正是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破产的鲜明标志。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6，911页。

② 《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第249页。

③ 同上书，第130，249页。经过引者换算。

④ 同上书，第149页。

四、希特勒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对法西斯“民族社会主义”的批判

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由凯撒德国所开始的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发展。这一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和由此产生的财政资本公开恐怖专政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同第一次大战时期凯撒德国比较起来，法西斯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有了若干新的重要发展：

首先，法西斯德国早在**备战时期**，即已系统地推行了各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从而基本上实现了向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其次，希特勒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就其广度和深度说来，以及从其调节机构的庞大繁杂说来，都是德国历史上的空前现象。再次，希特勒政权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多和程度之深，也远远打破了凯撒德国的记录；再次，由于德国垄断资本实行了公开恐怖专政，因此，它对本国和欧洲广大地区人民，就以最残暴的方式，进行了有组织的、系统的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屠杀、剥夺、镇压和劫掠。因此，德国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也就达到新的高度。最后，德国垄断资本同法西斯政权的“个人联合”深度，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屈从程度，不仅在德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即就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而言，也是登峰造极的。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在法西斯专政时期，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高度发展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按其实质说来，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象凯撒德国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样，仍旧是：在经济军事化和进行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条件下，德国“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①在法西斯德国，希特勒政权所采用的一切公开恐怖手段，同样只是为了保证垄断资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已。“第三帝国”的全部使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列宁论断的准确和深刻性，列宁写道：“……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②

为了掩盖上述反动实质，希特勒分子却用孔雀毛来装饰“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只乌鸦，美其名曰：“民族社会主义”，藉以蛊惑人心。但是，法西斯匪帮的罪恶实践，却对“民族社会主义”真相作了无情的自我揭露：希特勒的所谓“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剥夺和迫害德国犹太人，是侵略、屠杀、压迫和掠夺欧洲各国人民的同义语，是极端暴虐的日耳曼沙文主义；希特勒的所谓“社会主义”，同样不过是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遮盖布。例如，他们口头上高喊：“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完全没收一切战争利润”，行动上却千方百计帮助寄生的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限度的军事利润，帮助容克地主和富农分子对广大农民进行中世纪式的剥削，并用军事手段保护这些利润和剥削收入；他们口头上高喊：“要求所有……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国有化”和“大银行收归国有”，行动

① 参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页。

②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页。

上却把私人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坚决卖还给资本家，把国有企业装备廉价出售给私人资本，不仅丝毫不肯触动垄断资本集团的财产，反而无所不用其极地协助后者扩大自己的财富；他们口头上高喊：“……把德国工人的解放扩充到分享红利、分享所有权和分享领导权”，行动上却剥夺工人阶级的一切经济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把工人变成资本家——“领袖”们的“工业农奴”，任凭后者尽情剥削和摧残工人；他们口头上高喊：“无代价地没收土地”“以供自由农民移植之用”和“废除地租”，行动上却尽力巩固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制度，大量培植反动富农，和加速广大贫苦劳动农民的破产；他们口头上高喊：“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和“建立并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行动上却强迫大批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变成无产者，把他们送到军事工厂服苦役，并用行政暴力迫使中小资本家接受垄断组织的吞并，等等，等等。^①

欲盖反而弥彰，拆穿之下，“乌鴉毕竟是乌鴉”！希特勒的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最带掠夺性和强盗性的帝国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底死敌”的制度，^②“即使经过最精密的检查，也不能在它里面发现一点点社会主义的成分”。^③

在德国历史上，包括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曾经给当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擦脂抹粉，把后者美化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或“军事社会主义”；希特勒纳粹党玩弄“民族社会主义”的花招，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手法，它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攫取了上述各种反动分子早已破产的旧技而已。

正如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兴起一样，“第三帝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德国资本主义制度强大的表现；相反，它倒是德国“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的“最后挣扎的表现”。^④但是，历史发展规律是改变不了的，一切反动派也是必定要遭到灭亡的。毛主席早已明确指出了德国法西斯的可耻结局。1938年，当希特勒分子正趾高气扬和得意忘形的时候，毛主席即曾断言：包括德国在内的“法西斯国家”，已处于“大崩溃的前夜”；^⑤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时，毛主席更进一步具体指出：“……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⑥其后不久，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文章中，毛主席再次明确写道：“……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⑦法西斯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部破产，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

① 关于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各种口号，均摘自纳粹党的《25点纲领》及其他纳粹官方文件。转引自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72—474页。

② 斯大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26页。

③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0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5页。

⑤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3页。

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8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1页。